

在「東北」與「滿洲」之間

——近代東北殖民史書寫

● 林曉萍

一 何為「在『東北』與『滿洲』之間」?

光緒三十四年(1908)七月初八日，東三省總督徐世昌覆外務部函中，全文皆以「東三省」指稱東北地區，如「東三省土地膏腴五穀產額甚廣」、「茲系統就東三省籌度情形通融辦理」，唯有第一處誤寫「滿洲」，隨後更改為「三省」。徐世昌此函中多有沿用日本人常用的「南滿海路」、「北滿」說法，卻唯獨對「東三省」有執念^①。可見「東北」與「滿洲」之爭，自清末以來便有之^②。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日本扶持的偽滿洲國隨着日本帝國的崩潰而瞬間土崩瓦解。關於近代中國東北這段殖民歷史，在二戰結束後的中日學界皆有零星的研究成果出現。戰後中日學界對於近代東北殖民史有着顯著不同的定位。中國學界將其納入淪陷區研究史範疇進行研究，而日本學界則出現了中國東北地域研究、滿洲史研究、殖民史研究等多種表述。可以說，關於整個中國東北的歷史書寫，始終存在一種「東北/滿洲」的書寫區分。但是由於兩國各自的歷史原因，真正對該段歷史展開研究則是在1970、80年代後。本文旨在通過考察1970、80年代以來中日學界相關「東北/滿洲」史研究成果，嘗試從「東北立場與滿洲立場的歷史書寫之間」的角度，評介這一時期的研究特點。

關於近代東北殖民史的書寫，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以東北為基本出發點的歷史書寫，另一種是以滿洲為基本出發點的歷史書寫。其中，以東北為基本立場的殖民史書寫，從研究重點側重上區分，大致可以分為三種，分別是侵略(淪陷)史書寫、解殖視角下的個體生命史書寫和雙重性視角下的現代化歷史書寫。這三種近代東北殖民史書寫都有一個相同的基本立場，即基於民族國家視角下產生的反帝國主義或抵抗殖民侵略的正義性的敘述。三種歷史書寫雖然共用同一書寫前提，但由於處理這段殖民史中的具體問題方面存在差異，在充分凸顯其研究意義的同時也各自面臨着一些困境。

以滿洲為基本立場的殖民史書寫，則比東北立場的情況更為錯綜複雜。事實上，滿洲立場的殖民史書寫並不與東北立場共用前提。本文將它們歸為

一類的根據是，這類型的歷史書寫皆不以民族國家作為研究該段歷史的關鍵因素。此類型的研究者大致可以進而分為兩小類，即國家史書寫和地域史書寫。

就中國大陸學界關於東北淪陷史的學術研究梳理來看，或有主張1980年開啟說^③，或有主張1986年開啟說^④，但大部分學者皆認同東北淪陷史研究在1980年代以前已經積累了一些成果，而在1980年代後則出版了大量研究著作和史料彙編，使相關研究進入一個新階段^⑤。

台灣學界對於偽滿的研究起步較晚，成果相對較少。許雪姬認為台灣學界最早關於偽滿的專著類成果是蔡雅祺在2010年出版的《製造戰爭陰影：論滿洲國的婦女動員(1932-1945)》一書^⑥。如果不局限於偽滿，將學術史梳理擴展至整個東北歷史的話，還有一些相關論文成果，如林明德的〈偽滿洲國與反滿抗日運動〉、林滿紅的〈「大中華經濟圈」概念之一省思——日治時期台商之島外經貿經驗〉、陳慈玉的〈中國東北的鋼鐵業(1915-1945)〉等^⑦。雖然台灣學界關於偽滿的專著出版較少，卻對日本、英語學界相關著作保持了較高的關注度，發表不少相關書評^⑧。近年台灣學界的偽滿研究活動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2014年台灣年刊《暨南史學》第17期彙編的「滿洲國史專號」，刊載了林志宏、鄭欣挺、佐藤仁史、菅野智博等學者的幾篇研究文章^⑨。

就日本學界的情況來說，左近幸村認為，雖然日本在戰前因「滿洲國」的關係積累了許多研究成果，但這一時期的滿洲研究是日本殖民地政策的延伸，而對東北亞作為「地域」的關心則很少，這樣的研究僅僅是「被擴大的一國史觀」；而戰後日本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十分重視革命主題，因此忽視了中國東北地區的研究意義；日本學界真正開啟滿洲研究，當以1984年西村成雄出版的《中國近代東北地域史研究》為代表。這裏左近幸村應該是將滿洲置於日本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脈絡中而得出的結論^⑩。金子文夫則將滿洲問題置於日本殖民研究中進行學術史梳理，認為直到1960年代後半期日本人仍然缺乏對殖民地的關心，但是在1965年後湧現一批以安藤彥太郎、栗原健、角田順、緒方貞子等學者為代表的滿洲研究者^⑪。

總體而言，從山根幸夫編的《中國史研究入門》中關於日本學界對「東北/滿洲」研究部分的介紹來看，1970年代以後日本學界才開始出現較多相關研究成果^⑫。塚瀨進在對戰後日本學界關於滿洲史研究的梳理中，也指出1970年代是日本學界滿洲研究的轉捩點，此後該領域研究才取得注目的成果^⑬。松田利彥指出，1990年代中後期，日本學界受到英國帝國史研究影響，開始興起帝國史研究，初期主要由研究日本史或「滿洲國」史的日本學者主導，因此此時「滿洲國」史研究成果也較多^⑭。

關於「東北/滿洲」書寫之爭，早在1930年代便已開始，當時中日歷史學界圍繞着「滿洲」到底是一種族名稱、地域抑或國名產生過激烈的爭論。其中，以顧頡剛、金毓黻等為代表的中國學者的一個共同認識是，東三省屬中國固有領土，抵制以市村瓚次郎、稻葉岩吉為代表的日本歷史研究者所提出的「滿洲」說。當時中國歷史研究者以命名政治的視角認為，「東北」稱呼意味着東三省區域坐落於中國領土範圍中的東北方向這一基本特點，進而強調東

北作為中國領土的重要組成部分^⑤。因此，東北立場是以民族國家的視角來思考，而滿洲立場則試圖淡化這一民族國家因素。

那麼，為何本文題為〈在「東北」與「滿洲」之間〉？其一，從1930、40年代中日學界的歷史研究者交往來看，譬如金毓黻與稻葉岩吉在1936年前仍保持着良好的友誼，金毓黻的東北史書寫與稻葉岩吉的滿洲史書寫背後雖存在兩種史學書寫立場，但並不能改變東北歷史知識的共享和交流關係^⑥。實際上，東北立場與滿洲立場的歷史書寫並非截然二分，只是相對於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侵略史或殖民史書寫，滿洲立場所重視的個體生命史呈現出與東北立場的民族國家書寫不同步的一面。其二，本文主要的研究重點將落在1970、80年代後相關研究著作之上。不同於矢野仁一、稻葉岩吉等研究與日本殖民政策有着錯綜複雜的關係^⑦，這些研究著作的特點在於，基本上都認可「滿洲國」是偽政權或傀儡政權，並在此基礎上討論該段殖民時期歷史書寫的差異，不能將東北與滿洲截然二分。

在「東北/滿洲」史研究中，所謂「近代東北殖民史」有狹義與廣義兩種劃分。狹義是指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以後，在日本扶持下所建立的偽滿的歷史；廣義則往往追溯至清末時期，到二十世紀中期結束，甚至也有囊括更為廣泛的歷史時期的研究著作出版。因此，本文在討論各種涉及近代東北殖民史書寫的研究著作時，將隨着著作關注重點而變動，在廣義與狹義之間「旅行」。

二 東北立場的殖民史書寫

(一) 侵略(淪陷)史書寫

中國大陸的侵略(淪陷)史書寫強調民族國家視角，重點呈現的是近代中華民族遭遇帝國主義侵略與抵抗的整體史。在此一視角下，帝國主義對東北的侵略史以及從殖民地視角出發的淪陷史皆是重要的書寫角度。侵略(淪陷)史立場鮮明，順應二戰後全球殖民地與半殖民地逐漸實現獨立、確立主權，進行非殖民化的大勢，從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立場出發，對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的侵略暴行進行清算。關於侵略史視角的研究著作及綜述文章諸多，此處主要分析鬥爭或抵抗視角的研究。東北殖民史的抵抗敘述可分為兩種：一種重視集體性、軍事行為，另一種相對於集體，更加關心個體的抵抗行為；前者是抗戰史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後者則隨着口述史的興起與發展取得了一定成果。

具體到近代東北殖民史研究中集體性軍事抵抗情況的介紹，則體現在學界對東北抗日義勇軍地位的強調，建基於對東北抗日義勇軍與東北抗日聯軍研究的豐富成果之上。胡玉海強調，「東北抗日義勇軍的抗戰，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一部分」，「以義勇軍為主力的抗戰時間雖然不長，但卻表現出具有無可替代的歷史作用，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乃至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都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⑧。谷曼亦將東北抗日義勇軍的地位界定為：「『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廣大東北愛國民眾面對日寇入侵、國破家亡的嚴峻形勢，自發組織

起來的抗日武裝。……東北抗日義勇軍的奮起抵抗，拉開了中國人民十四年抗日戰爭的歷史序幕，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佔有重要地位。」^{①9}從中可以看到，東北抗日義勇軍研究希望借助侵略(淪陷)史書寫視角，將東北地區集體性軍事行為與全國範圍的抗日歷史相聯繫。這些研究不僅表明了東北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依舊心向中國，更證明東北是抗日戰爭的重要一環，是中國領土的組成部分，同時也強調今日東北近代史研究者對民族國家敘述的高度認同。

同樣的抗戰史書寫也發生在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歷史敘事中。淺野豐美指出，在中國大陸的革命鬥爭史觀與中華民族史觀下，對台灣的歷史認識與認可日本在台灣日據時期帶來近代化發展的台灣「獨立派」存在嚴重的偏差；中國大陸的相關書寫強調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積極反抗日本人的歷史，通過描述積極抗戰的一面，將台灣納入作為中國近代重要事件的抗日戰爭的歷史敘述之中，以彌補台灣的近代角色缺失^{②0}。但是，當相關研究高度認同民族國家敘述，強調東北義勇軍抗戰的歷史意義時，常常不得不面對「以義勇軍為主力的抗戰時間雖然不長」或「東北義勇軍儘管其崛起具有地域性」^{②1}的「複線歷史」敘事(下詳)。

除了上述集體性、軍事的抵抗書寫之外，隨着近年來口述史研究的發展，個體的、底層的抵抗敘述逐漸被發掘出來，代表作有齊紅深分別在2008和2011年編著的《流亡：抗戰時期東北流亡學生口述》、《黑暗下的星火：偽滿洲國文學青年及日本當事人口述》等^{②2}。在《流亡》一書中，孫一回憶自己在「滿洲國」上學的情況，說到「因為有的老師在上課時宣傳抗日思想，述說中國抗日前線的消息，學生們都受到一些愛國主義教育，所以不免在互相嘮嗑時流露出反滿抗日的思想」；張興武則回憶自己如何真切地感受到「亡國奴」處境，「到長春讀大學以後，中日同學待遇明顯不同，學習、生活處處受到歧視，這才直接嘗到做亡國奴的痛苦滋味」^{②3}。但是這些個體的聲音，很大程度仍然可以歸類為站在東北立場的敘述。他們在表達自身在殖民環境中的遭遇時，常常只能借助國家提供的「侵略/抵抗」敘述來傳達給讀者。

(二) 解殖視角下的個體生命史書寫

李文良指出，以往日本學界的台灣殖民地史研究十分重視強調日本的異民族統治身份，通常從資本主義經濟觀點出發，對統治者的掠奪以及與之相對的殖民地民眾的抵抗課題進行研究。這樣的「掠奪/抵抗」民族史觀，由於與戰後台灣「國家意識」以及反帝國主義道德觀相一致，因而成為了台灣早期日據時代史研究最為普遍的解釋框架。這樣的「掠奪/抵抗」史觀之論斷固然正確，但卻無法充分解釋日本統治台灣後期當地進入安定狀態的歷史情況^{②4}。

「侵略/抵抗」敘述在近代東北殖民史的研究中也面臨着同樣的困境，逐漸無法推進相關研究的發展。以劉曉麗為代表，對「侵略/抵抗」敘述發起挑戰。在2008年的《異態時空中的精神世界：偽滿洲文學研究》一書中，她嘗試超脫二元對立分析範式，呈現偽滿時期文人複雜的人物性格和生命歷程，認為「受制於1980年代的研究環境，雖然思想解放運動已經普遍展開，但過去的思維

方式還在束縛着一部分研究者，他們依然採取『反抗』與『附逆』的二分思維對待複雜的偽滿洲國時期的文人及作品，還延用着是與非、敵與我的兩極批評標準，並且簡單地認為和日本人有人有交往的文人都可能有不好談論的問題」²⁵。這促使她提出「解殖文學」的概念²⁶：

解殖文學，指居住在殖民地或者在殖民地成長起來的作家，他們在殖民歷史現場創作並發表多種多樣的文學作品，隱去了作者情緒溫度的零度寫作、無評估義務的旁觀是其常見特徵，解殖文學與殖民統治共在，其承接龐雜的文學傳統和思想資源，或專注波瀾不驚的日常瑣碎生活，或書寫歷史故事與傳說，或描寫自己的小小哀傷和微微喜悅，或關注性別、青年、鄉土、生態等問題……這些作品所呈現的世界和情緒混雜而曖昧，既是殖民地精神生活的掠影，又常常在不經意處與殖民統治意識形態宣傳相左。這些文學作品如雜草般生長在殖民地，卑微而有韌性，只要有適宜的環境便迅速生長，四處蔓延，又如腐蝕劑般慢慢地消解、溶解、拆解着殖民統治，因此稱之為解殖文學。

延續該研究視角，她發掘超越「侵略/抵抗」敘述之外的多元殖民史書寫，得到了許多偽滿文化、文學研究者的認可，以致近年來出現了幾乎可以稱為重寫偽滿文學史的趨勢。其中2017年由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劉曉麗主編的「偽滿時期文學資料整理與研究」叢書為重要標誌。該叢書共有三十四冊，分為三卷：作品卷、史料卷和研究卷。此外，還有2016年陳言著的《忽值山河改：戰時下的文化觸變與異質文化中間人的見證敘事(1931-1945)》，2017年劉曉麗、葉祝弟主編的《創傷：東亞殖民主義與文學》等相關專題著作出版²⁷。

此處簡要呈現兩部收錄於「偽滿時期文學資料整理與研究」叢書中研究卷的著作以詮釋該叢書的書寫理念。加拿大學者史密斯(Norman Smith)的《反抗「滿洲國」：偽滿洲國女作家研究》一書展現了但娣、藍苓、吳瑛等偽滿女作家繼承了五四運動精神，嘗試在殖民空間中探尋殖民政權和反抗男權的一面。在史密斯的書寫中，這些身處偽滿的作家並非千篇一律地毫無「中國性」，而是堅持着自己的抵抗底色。同時，這些女作家面臨着殖民政權與男權的雙重暴政，該書不僅包含對殖民政權的抵抗維度，還存在一個鮮為人知的性別權力抵抗維度²⁸。日本學者大久保明男的《偽滿洲國的漢語作家和漢語文學》一書對駱駝生、古丁等作家、報刊以及重要文學會議等進行了介紹，並分析了作家筋嘯在1932年刊載的一系列色情荒誕文學作品所體現的反殖民體制精神；在奉行孔孟儒教的偽滿初期，這些衝擊社會儒教倫理規範的性描寫、性荒誕、性愁悶，甚至可以視作「反體制政治意識的流露」²⁹。

大久保明男的研究立場與劉曉麗相近，嘗試改變學界通過是否服務於殖民統治來判斷文人忠奸的單一標準，呈現出對個體生命在面對殖民暴政之下無法選擇的諒解。然而，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在研究卷中，不同研究者的「諒解」程度也是有差異的。比如韓國研究者金在湧認為在審視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作品時，必須考慮到每個時段所具有的特性。當作者認為迂迴的寫作方式無法達到抵抗目的時，能做的選擇便只有保持沉默；但這並不意味着保持沉默

的所有作家都帶有反抗的性質，只有在日本殖民統治末期突然保持沉默，才能將其理解為作者抵抗的手段，因為日本殖民統治末期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合作與抵抗的兩極分化。在我們嘗試突破「合作/抵抗」二元敘述時，也有必要分清兩種情況：第一種是當時文人或者範圍更廣泛的知識份子群體腦海中根深蒂固的「合作/抵抗」的二擇一道德觀念；第二種是時人以及後來的研究者和歷史評論者囿於簡單化的「合作/抵抗」二元視角，因而忽視的人的多元性和隱性抵抗。對於第一種情況來講，如果「合作/抵抗」在當時的道德規範而言是一個二擇一問題的話，那麼學界對那些選擇不抵抗的人是不是要提出更為嚴格的指責？這是一個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⑳。吳雅琪在對史密斯一書進行評介時也指出，其對書名《反抗「滿洲國」》存有疑惑，認為這些女作家是否具有反抗的具體行動，實宜進一步探究^㉑。

解殖視角下的個體生命史書寫比起「侵略/抵抗」視角的研究更加細膩多元，相關研究者希望以溫柔的目光投射到歷史的褶皺處，在大歷史書寫下為個體生命留下歎息的空間。同時我們需要注意到，探尋中國東北解殖話語，是為了回應近代日本以殖民暴力構築東亞一體的實驗下，中國研究者對「亞洲」命題思考的缺乏。推動中國大陸解殖研究的劉曉麗認為，近代日本殖民研究中不僅存在日本暴力統治的東亞（「東亞新秩序—東亞共榮圈」）敘述，還有遭受日本殖民掠奪下由「琉球、中國台灣、朝鮮半島、偽滿洲國以及華北華中淪陷區乃至東南亞等地的反殖民、反侵略的多種多樣的抵抗及相互聯合的運動」所形成的另外一種東亞連帶、東亞共同體書寫^㉒。因此，解殖研究意在發掘殖民統治下多種多樣的反抗聲音。

（三）雙重性視角下的現代化歷史書寫

殖民主義與現代性有着密切的關聯。殖民主義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推動現代化，但在另一些情況下也可能構成現代化的障礙^㉓。關於殖民主義這一雙重性問題，來源於馬克思在討論英國對印度實施殖民統治問題時提出的「殖民主義的雙重使命」論。對此，中國學界進行了充分的討論^㉔。曾作為半殖民地的中國，在書寫殖民史的時候是如何面對這種殖民主義的雙重性？

史書美在討論中國殖民地的現代主義問題時指出，一些中國知識份子通過將西方區分為「都市西方」與「殖民西方」的方式來「接納」代表現代化的西方；這裏「西方」也可以由作為西方世界亞洲代言人的日本所取代^㉕。但這種簡單的兩分法並沒有徹底解決半殖民地知識份子的困境，他們依舊不得不在擁抱現代化與承受殖民統治的夾縫中掙扎；在史書美研究中，可以看到這一殖民兩面性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而且被擱置到今日的中國敘事之中。而同樣的困境也呈現在近代東北殖民史研究裏，主要表現為如何評價日本在「滿洲國」所進行的經濟現代化問題。

1990年，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翻譯出版了由日本《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所編輯的《滿洲國史（總論）》。在該書發刊詞和推薦辭中，開拓「滿洲國」的要人平島敏夫認為，自己確確實實給東北地區帶來了經濟復興，「在

此暫短期間，滿洲國卻經受住了戰爭的沉重壓力，產業經濟、文化教育等所有方面都取得了飛速發展，實堪稱為近代史上的奇迹，它不僅促進了亞洲各民族的獨立，而且也是中國今日發展的一大動力。這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該書推薦人岸信介提到，「如今，在中國的經濟領域中還殘留有許多當年的設施、制度、技術和人材的蹤迹」。另一推薦人椎名悅三郎也認為，日本技術青年來到「滿洲國」後，「使滿蒙的資源終於從長眠之夜中蘇醒，得到了開發利用」，並將東北經濟發展原因統統歸結於日本不畏艱辛的青年的奮鬥結果³⁶。

針對由日本右翼宣導下興盛的「滿洲開發說」，日本另外一些研究者則從馬克思主義研究，尤其是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路徑出發，強調日本殖民統治對殖民地帶來的沉重災難，例如以西村成雄、岡部牧夫等為代表的中國東北史研究，或者以井上清、依田熹家、淺田喬二為代表的日本帝國主義研究³⁷。

面對「滿洲國」殖民參與者的這種殖民現代化敘述，中國大陸學界研究者的觀點也較為一致，主要從三方面進行反駁，分別是製造傀儡政權的事實過程、溥儀統治的虛偽性以及日本殘忍的殖民統治事實，但是選擇避開直接討論日本殖民所帶來的殖民現代化問題³⁸。後來大陸學者進一步對殖民現代化的相關觀點予以駁斥：他們認為日本在東北的殖民經濟建設是以日本帝國的利益為主，而非為東北民族工業或者東北民眾的幸福着想。同時，以重工業為主導、以勞力為犧牲代價的經濟發展模式給東北經濟發展帶來弊端。另外，他們認為日本的「遺產」是因戰敗而留下，並非有意貢獻，強調1931年前，東北經濟建設已打下基礎，日本的經濟建設建基於對東北地區的「劫奪」和「攫取」，並突出偽滿時期東北工業發展中中國民眾參與建設的能動性及對殖民政權的抵制³⁹。燕紅忠則進而從貨幣、信用與貿易角度對東北近代金融進行研究，既指出了營口過爐銀運行機制等東北自身的金融制度的優勢與不足，同時也呈現出日俄帝國主義對東北舊有地方經濟結構的破壞與引進近代金融體制的雙重特點⁴⁰。

由於在日本、英語學界的近代東北殖民史研究中，尚未對殖民與現代化的關係進行深入分析，因此出現了許多主要討論日本在殖民地的現代化貢獻，或者更加偏向陳述日本現代化成就的研究著作。一方面，不同於《滿洲國史（總論）》，這些研究著作往往默認民族國家敘述下的中國主權立場，即認為「滿洲國」是傀儡政權或偽政權，有些著作還十分重視陳述侵略（淪陷）史觀點；另一方面，這些依據現代化視角下的「滿洲（國）」近代史書寫十分推崇日本統治時期的經濟貢獻，從而與《滿洲國史（總論）》存在某種暗合。這樣的研究著作與論文有許多。例如，1988年日本學者越澤明所著的《偽滿洲國首都規劃》，是了解日據時期「滿洲國」首都「新京」（長春）建設與規劃的一部重要著作。全書的書寫重點在於：以後藤新平等為代表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家與技術人才，如何在新京這塊試驗點上進行着建造百年國都的計劃。在越澤明的描繪中，代表日本先進性的技術人才有着不同於日本政治家、軍人的視野與時間觀，而沉浸在打造一個能夠代表現代先進水平的百年百萬人口城市規劃之中⁴¹。2019年美國學者蘇夏（Bill Sewell）的《重塑帝國：日本人在長春，1905-45》（*Constructing Empire: The Japanese in Changchun, 1905-45*）一書中也觸及到該

時期的長春建設；在討論該時期的經濟發展問題時，蘇夏亦對日本之於東北現代化的貢獻給予認同與讚賞⁴²。

無論是越澤明還是蘇夏的近代東北殖民史現代化研究，皆可以看作是史書美所說的「都市西方/殖民西方」兩分法矛盾下的產物。也就是說，不僅是身處殖民環境的中國知識份子著作，戰後的殖民書寫中也出現了相同的兩分認知，即在規避談論殖民暴行的情況下，或書寫殖民者帶來的現代化成果，或呈現殖民/侵略後的現代化成果與殖民地所承受的慘痛代價。

三 滿洲立場的殖民史書寫

(一) 國家史書寫

如果肯定偽滿敘述，承認「滿洲國」是傀儡政權，怎麼還會有所謂的「國家史」書寫？事實上，關於近代東北殖民史的歷史書寫中確實存在着多種國家史書寫。這裏將評介兩種承認偽滿敘述下的國家史書寫。

其一，有些研究者認為「滿洲國」雖然是傀儡政權，是從屬於日本的殖民地，但畢竟是日本以「獨立國」名義統治的殖民地，比起台灣等殖民地有其特殊性⁴³。1930、40年代，「滿洲國」以「獨立國」的姿態存在，在此前提下設立了一套國家行政機構。中見立夫曾對「滿洲國」的外務省進行研究，認為可以從外務省的組織結構和人事更替入手，揭示「滿洲國」的傀儡性質⁴⁴。平田康治則將「滿洲國」政治經濟體制稱為「戰時開發國家」(wartime development state)體制。「開發國家」概念本來被用於描繪國民黨政權，其四大特徵是國營企業的主導作用、重視重工業、偏重國防與制訂國家經濟計劃。他強調，「滿洲國」經濟規劃也受到蘇聯體制的影響，早在制訂經濟政策之初便對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經濟持批判態度，而更為青睞國家統治強力干預下的經濟運營策略，因此其經濟規劃具有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特質⁴⁵。岩崎育夫則提出了「殖民國家」的概念。他在研究亞洲國家史時，認為亞洲在歷史上存在過三種類型的國家形態，分別是王朝國家、殖民國家和現代國家。一般來講，我們認為殖民地(諸如英屬殖民地與日本統治下的「滿洲國」)不能視為國家。但他認為，雖然殖民地國家事務的最終決定權把握在他國手中，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具有國家形態的殖民地有着自上而下的一套嚴格規章制度與統治秩序，從這個層面而言，也應該將殖民國家納入國家史的研究範疇⁴⁶。

由此可見，國家史書寫其實強調「滿洲國」是一種特殊的殖民地形式，其書寫角度着重於突出「滿洲國」與日本殖民地的差異性——一種獨立國家形態——而不是同樣作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這一處境的共同性。

其二，有部分研究則強調，「滿洲國」不僅僅是「傀儡國家」，而且具有「理想國家」的一面。1993年山室信一在《基美拉——滿洲國的肖像》一書中提出「滿洲國」歷史同時蘊含着「理想國家」與「傀儡國家」的雙重性，得到許多「東北/滿洲」研究者的認同。山室信一認為「滿洲國」是具有雙重性的：一邊是被

稱為「傀儡國家」的「滿洲國」，強調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侵略與關東軍對「滿洲國」的控制；一邊是被稱為「理想國家」的「滿洲國」，強調岸信介等戰後官僚對「滿洲國」的烏托邦建構經驗的懷念、日本對「滿洲國」經濟等社會發展的貢獻，以及共榮設想與大西洋主義理念的邏輯同構^⑦。

山室信一的觀點與三谷太一郎於1992年發表的〈滿洲國國家體制與日本的國內政治〉一文有暗通之處。後者指出，1920年代後半期到30年代初期，日本國內處於政黨體制之下，政府主要支持以軍縮條約和金本位為基礎的國際協調主義。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陸軍軍人石原莞爾提出將日本打造為「為世界大戰做準備的『高度國防國家』」的目標是難以實現的——他認為，為了實現對外的「國防國家」目的，必須先完成國內改造，而「滿洲國」的存在正是承載了「國內改造論」支持者夢想的理想地域。因此，三谷太一郎認為這樣的「滿洲國國家體制並不是同時代日本政治體制的延長，反而是作為日本政治體制對立面的理想式的存在」^⑧。

可以說，山室信一的「雙重性」說，開拓了新的研究視角。相較以往日本殖民地研究視角下強調「滿洲國」的傀儡性，「理想國家」視角則提醒研究者當時日本人對「滿洲國」持有的複雜態度。陳榮聲高度評價《基美拉》一書，認為該書的價值在於「以一種持平但又不失立場的態度來理解滿洲國」^⑨。當然，山室信一的「雙重性」說對推進「滿洲國」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但我們也要注意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比如「傀儡國家」與「理想國家」兩者在「滿洲國」研究中應該如何定位，兩者是否對於「滿洲國」研究有着同樣的意義？同時，我們要注意到無論是山室信一還是三谷太一郎，以至日本主流學界的「滿洲國」歷史研究皆服務於日本歷史反思的需要，其目的是解釋日本在近代的所作所為和精神結構。從「理想國家」這種提法，我們也可以看到山室信一主要關心的是日本人如何看待「滿洲國」，以及「滿洲國」對於日本來說意味着甚麼，因此當時中國人（如「滿洲國」政權的中國籍領導人）的想法在相關論述中缺乏關注。

關於如何書寫偽滿這段殖民歷史，中國大陸學界也有分歧。1980年代以來幾部重要的東北淪陷史研究著作都是以「偽滿洲國」之名進行書寫的^⑩。對此，蘇崇民認為「將這一階段的東北史稱為滿洲國史固然荒謬，而將之稱為偽滿洲國史也不盡符合歷史的本來面目」，國內學者書寫的「偽滿洲國史」雖然對偽滿持批判態度，「揭露『滿洲國』是傀儡政權統治下的人間地獄」，但也仍然落入了《滿洲國史（總論）》所設定的框架：「將『滿洲國』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政權……寫它的發生、發展和滅亡。」^⑪這種情況充分反映了國內學界對於偽滿相關的「國家史」書寫的糾葛態度。

（二）地域史書寫

近年來日本學界愈發重視地域史研究。這裏的地域史是多層次的，有對民族國家範疇內個別區域的關注，也有追求超越國境的地域史研究。後者分為幾種，有容納民族國家單位的東亞、東南亞地域研究，也有強調海洋主體性的海域史研究，等等；2008年左近幸村主編的《近代東北亞細亞的誕生——

跨境史的嘗試》便是其中一種。「跨境史」的特點在於：第一，比起「越境」較為強調某一方視角，「跨境」更加強調雙方視角；第二，在承認境界存在的基礎上，突顯各種跨越境界的移動層面；第三，強調包含了國境的空間是具有區域性的^②。地域史研究本身有着豐富的內涵，該研究的關鍵之處在於對「境」的跨越，或者說希望呈現不同於以民族國家為絕對主體的歷史敘述。其中圍繞滿洲的相關地域史書寫中，小峰和夫與塚瀨進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

小峰和夫在1991年出版了《滿洲(滿珠利亞)——起源·殖民·霸權》一書，認為戰後日本的滿洲研究主要以日本近代史研究者為中心，偏向重視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尤其是1931年「滿洲事變」(即「九一八事變」)後的這一歷史階段。戰後日本滿洲研究主要以殖民侵略研究視角為主，而關於滿洲自身的由來與地域個性的研究意識則不太鮮明。他指出，從明朝到1910年代這段時期來看滿洲的話，該地域具有處於中華延長線上與作為殖民開拓地的兩面性：一方面「滿洲不過是中華延長線上的土地罷了」，包括利用廢帝溥儀擔任「滿洲國」皇帝，也可以視作該地域的中華化；另一方面滿洲具有獨特的地域特性，概括來說便是「作為殖民開拓地」這一特性。清朝初期以來，漢人、滿人、蒙古人、俄羅斯人、日本人、朝鮮人等遷移進入滿洲，形成當地具有多民族混雜特徵的國際殖民開拓地的性格：「總結來說，滿洲並不僅僅單純是中華的延長，也孕育了自己獨特的地域性。『滿洲國』的虛構性已被現實進一步證實了，但是不能忽視的是，在攻擊『滿洲國』的虛構性時，很有可能也會忘記滿洲的地域獨特性。這兩個問題需要區別看待。」所以，小峰和夫的一個重要寫作出發點是，探尋被「滿洲國」虛構性所遮蔽的滿洲自身的地域特殊性^③。從此研究角度出發，小峰和夫從明朝的滿洲經略與女真族的崛起開始，敘述了一段屬於滿洲的地域史。

不同於戰後日本近代史研究者十分重視的殖民侵略問題，小峰和夫更加重視、突出研究地域本身的歷史書寫。這一研究視角進一步被塚瀨進繼承。塚瀨進雖然在左近幸村主編的《近代東北亞細亞的誕生》一書中發表了〈中國東北統治的變動——以1860-80年代的吉林為中心〉一文^④，但是他的「跨境史」嘗試走得更遠一些。在1998年出版的《滿洲國：「民族協和」的實像》一書中，塚瀨進提出日本學界關於「滿洲國」是日本殖民地的說法已有定論，因此其研究主要是將「滿洲國」置於日本殖民地史研究的視角下進行。但是，他認為過去日本學界的「滿洲國」研究過於重視將滿洲置於日本殖民歷史之下，而忽視滿洲的地域性。因此，該書嘗試「從作為地域的滿洲出發進行觀察的滿洲國歷史」的角度進行研究^⑤。此時，塚瀨進雖然提出了作為地域史的「滿洲國史」研究的重要性，但尚未進行深入研究。不過，該書中有兩個方面卻值得我們注意。一方面，強調地域所具有的超越國境的歷史處境和特徵，具體到中國東北地區，則是突出其地處俄、日、中(滿、漢)等多國多民族歷史環境之中，這些觀點和小峰和夫完全一致。不同的是，另一方面，質疑中國學界提出的偽政權或傀儡政權敘述，詰問民族國家及其國境意識是否適用於民族國家未建立之前的歷史。不過，該書在討論「滿洲國」的「民族協和」問題時，仍然比較明確地指出了民族協和的虛偽性，譴責作為指導民族的日本人與其他民族關係在現實中的不平等性^⑥。

2014年，塚瀨進的博士論文〈滿珠利亞的社會變動與地域秩序——從明代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了以滿洲（滿珠利亞）為對象、長達六百年的地域史書寫。他繼承了「跨境史」的研究風格，對滿洲（滿珠利亞）史的考察涉及俄羅斯西伯利亞史、中國史、朝鮮史、蒙古史等。近現代滿洲史研究中往往因強調傳統與現代的劃分而對歷史進行分割，而該文則更加重視地域自身的連續性^⑦。在前言中，塚瀨進提出自己寫作的一些重要觀點，值得我們注意。他認為不應該在現代主權國家形成前詢問滿洲是誰的領土，故而圍繞現代主權國家形成前的歷史，描繪出了一幅與現代國家敘述不同的「物語」（故事）。他進一步解釋道，「本文並非以『領土』與『民族』為單位來把握歷史，而是打算以『地域』這樣的空間為中心，達到構建歷史群像的目的」^⑧。該文是近年日本學界滿洲研究的重要著作，其地域史研究嘗試也十分具有創新精神，值得肯定，但也留下一些問題有待解決。

其一，塚瀨進選擇以「滿珠利亞」來表述中國東北地區。所謂「滿珠利亞」（マンチュリア）指的是英語“Manchuria”，而在中文語境中該詞常常被翻譯為「滿洲」，但是如果按照滿人歷史上使用「滿洲」一詞的情況來看，「滿洲」應該被還原為“Manju”（マンジュ）^⑨，而不是具有地域指向的“Manchuria”^⑩。根據中見立夫多年的研究，「滿洲」一詞在中國歷史文化中並不用來表示地域概念；他追溯「滿洲」一詞地域化的根源，認為地域化的「滿洲」概念是在歐美列強提出「東北亞」背景下誕生，而歐洲人所描繪的「東北亞」是作為亞洲地圖上最後一塊未開拓地而出現的，也就是說，「東北亞」概念是服務於歐美侵略東北亞事業的衍生物。借助「東北亞」這一概念，當時的朝鮮半島、中國東北部、俄羅斯遠東地區被視為一個統一體，因而成為日、俄等新進資本主義強國的利益爭奪之地。後來，地域化的「滿珠利亞」概念傳播到日本。隨着日、俄等帝國在東北亞瘋狂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日本遂提出了「南滿洲」、「滿蒙」、「蒙疆」等具有殖民侵略內涵的地域概念。中見立夫批評了日本肆意根據自己的需要創造地域概念的做法，並提醒人們關注詞彙概念背後的政治性^⑪。

雖然塚瀨進也參考了中見立夫關於「滿洲」詞彙的地域政治性研究，但是他更多的是繼承了小峰和夫的「滿洲（滿珠利亞）」觀。小峰和夫認為，以前的歐美國家用「東韃靼」稱呼中國東北地區，後來改用「滿珠利亞」稱呼中國東北地區是因為滿洲在十九世紀登上了國際舞台，並沒有殖民意圖。相反，他認為滿洲或「滿珠利亞」的表達可以提示中國東北地區自身的發展軌跡。戰後研究者往往為了否定「滿洲國」的殖民性，而否定滿洲的地域性表述，甚至抹殺一切該地域曾被稱為「滿洲」或「滿珠利亞」的這一地域自身特有的歷史事實，這種做法在小峰和夫看來是不妥當的^⑫。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學界對明清時期東北的研究取得較大的進展是在小峰和夫《滿洲（滿珠利亞）》一書出版之後，小峰和夫所提及的清人對東北的認識，以及日本人何時最早提出「滿洲」作為地域等結論，目前已被證明並不準確^⑬，這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小峰和夫的認識？從中見立夫的觀點中，我們可以發現「滿洲（滿珠利亞）」概念蘊含着殖民帝國的審視意味，仍然不是描述一個地域的中性表達。學者在書寫地域史時應該如何表述，或許也是值得我們繼續思考的重要問題。

其二，塚瀨進認為由俄國、朝鮮、中國等各國國境所構成的今日東北亞情況，至少是在1860年代《北京條約》簽訂之後才在曲折中逐漸形成，而「國民」的形成時間則更晚^④。在此一前提下，當我們討論十九世紀中後期之前的地域歷史，應該如何與以民族國家為主體、強調民族屬性與領土歸屬的敘述結構相適應，確實是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不過這裏要指出的一點是，十九世紀中後期在東北亞範疇內已經形成明確國境時，是否便應該按照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敘述來處理這段歷史？此問題引起了學界的熱烈討論，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觀點，他認為學界應該警惕線性歷史(linear history)並探索複線歷史(bifurcated history)存在的可能性，實現「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由於民族與民族國家會根據自身的需要裁減「歷史」以製造屬於自身的「合法性」外衣，因此歷史研究需要警惕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歷史敘述可能會吞噬真實歷史的多樣性與複雜性^⑤。塚瀨進的地域史書寫，或許可以視為反思單一線性歷史書寫的一個努力成果。

塚瀨進研究「滿洲國」的目的是希望在有別於民族國家主導的敘事下，尋找滿洲地域性的一面^⑥。但是，從地域視角來書寫滿洲並不意味着排斥或是淡化民族國家因素。正如霍布斯鮑姆(Eric J. Hobsbawm)指出的那樣，二十世紀上半葉可以說是「民族主義最高峰」^⑦。在研究1930、40年代東北歷史時，學者很難避免與民族主義以及因民族國家形成而逐漸產生的主權、領土等問題進行對話。另外，塚瀨進指出「滿珠利亞」在地理範圍上不與清代東三省、「滿洲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東三省領域完全重合，其研究中「滿珠利亞」的範圍將隨着歷史的變化而變動伸縮^⑧。但具體到其博士論文中關於「滿洲國」研究部分來看，其地域視角卻是呈現空間閉合的狀態，忽視與外界互動而產生的空間靈活伸縮的可能性。直觀的體現便是其研究失去了自山本有造、西村成雄等以來的學者所密切關懷的殖民視角，雖然可能出於對國家史敘述的抵制，但選擇對該段歷史的殖民色彩進行淡化，反而形成了固定的地域空間的內視視角。塚瀨進的地域史書寫面臨這樣的困境，是因為他雖然將「地域」概念從民族國家及國境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但是仍然受困於將「地域」視為一種地理意義上的有形空間。

這裏，我們或許可以參考一下毛里和子關於「地域」概念的觀點整合，她引述文化人類學者高谷好一的觀點，認為被稱為「地域」的地方，應該是住民共同享有一套世界觀的範圍。但是，許多現在我們所認識的「地域」顯然並不共用一套世界觀，更為突出的是像「東南亞」這樣的概念，完全是根據外在者所需要的價值與利益劃定的地理範圍。因此，毛里和子更加認可山影進對「地域」概念的認識^⑨。山影進認為，所謂「地域」並不是一個實在概念，而是一個操作概念，其實是個體與世界相聯繫的媒介。個體借助「地域」概念探尋在世界中自身與他者的位置，這是一個靈活的空間，一個關係性空間。「地域」的具體範圍也隨着個體與他者關係的變化而靈活伸縮^⑩。也就是說，為了避免從民族國家單一敘述走出後又落入以地域為主體的單一敘述陷阱之中，我們必須解放「地域」概念的內涵，將地域史研究中的「地域」視為一種個體與世界探索關聯性的操作概念，而不是物質的地理空間。或許這樣，才能書寫出真正不同於以往歷史研究的地域史。

四 小結

1970、80年代以來，中日學界的「東北/滿洲」研究成果可以說是汗牛充棟^①。既有一直堅持以此領域為研究對象的學者，也有從中國近現代史、東北史、殖民史、中日外交史、帝國史等諸多領域切入到該地域研究的學者。隨着觀察歷史角度的變化，圍繞近代「東北/滿洲」歷史的書寫也逐漸趨於多樣化，各種歷史書寫之間既有互相補足的一面，又有互相超越進步的一面。而後來進入此領域的研究者，面對豐富多樣化的研究成果，並隨着研究領域的日益細化，難免有愈來愈難從整體脈絡上把握學術史的問題出現。而本文即嘗試理解中日學界關於「東北/滿洲」研究命題的變化。本文僅從「東北立場與滿洲立場的歷史書寫之間」這一角度介紹了部分研究者對這段殖民史的書寫情況。如有任何疏漏之處，還望得到學界的指正、建議。

註釋

① 〈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為東省小麥等穀物由海路出口事給外務部諮呈並給督理稅務大臣諮覆及給外務部函 光緒三十四年七月初八日條〉，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編：《東北邊疆檔案選輯（清代·民國）》，第十二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5、6、8、9。

② 關於詞彙使用情況，中日清史研究學界多使用滿洲（Manju /マンジュ）指代清朝時的東北情況，關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偽政權的稱呼，中日學界多稱為偽滿洲國、偽滿，或「滿洲國」。日本學界強調東北地域史研究視角的研究，或近代政治外交史的學者則多使用「滿珠利亞」（Manchuria /マンチュリア）表述。

③ 張振鷲認為，中國學界東北殖民史研究大致始於1980年代，以1980年10月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史學工作者在大連聯合建立東北地區中日關係研究會，並舉辦第一屆學術討論會為起點。參見張振鷲：〈日本侵華史研究：一個粗略的回顧〉，《抗日戰爭研究》，1999年第3期，頁4-6。榮維木等也認為，淪陷區研究開始出現於1980年代以後。參見榮維木等：〈筆談「抗日戰爭與淪陷區研究」〉，《抗日戰爭研究》，2010年第1期，頁126。

④ 高曉燕認為，東北淪陷史研究開啟於1986年。1986年10月，《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編纂委員會在長春成立。編委會下設總編室，東三省分別組成遼、吉、黑編寫組。參見高曉燕：〈東北淪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南京大屠殺史研究》，2011年第3期，頁73。

⑤ 相關研究綜述，參見孫繼英：〈東北淪陷歷史研究回顧〉，《社會科學戰線》，2003年第1期，頁239-43；車霽虹、辛巍：〈東北淪陷史研究述評〉，《抗日戰爭研究》，2006年第2期，頁226-53；高曉燕：〈東北淪陷史研究綜論〉，《大慶師範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頁93-97；高瑩瑩：〈1949年以來的淪陷區研究綜述〉，《蘭州學刊》，2015年第5期，頁1-15。

⑥ 許雪姬：〈在「滿洲國」的台灣人高等官：以大同學院的畢業生為例〉，《台灣史研究》，第19卷第3期（2012年9月），頁97。文中提及的專書，參見蔡雅祺：《製造戰爭陰影：論滿洲國的婦女動員（1932-1945）》（台北：國史館，2010）。

⑦ 林明德：〈偽滿洲國與反滿抗日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期（1988年12月），頁195-210；林滿紅：〈「大中華經濟圈」概念之一省思——日治時期台商之島外經貿經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1998年6月），頁47-101；陳慈玉：〈中國東北的鋼鐵業（1915-1945）〉，《新史學》，第13卷第4期（2002年12月），頁67-117。

- ⑧ 陳永發、沙培德 (Peter Zarrow)：〈關於滿洲國之建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4期(2004年6月)，頁177-84；陳榮聲：〈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國の肖像》增補版〉，《台大歷史學報》，第42期(2008年12月)，頁287-93；吳雅琪：〈評介Norman Smith，《反抗的滿洲國：中國女性作家與日本的佔領》〉，《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43期(2010年6月)，頁291-300。
- ⑨⑩ 林志宏：〈「滿洲國史專號」導論〉，《暨南史學》，第17期(2014年7月)，頁1-10；2。
- ⑪ 左近幸村：〈東北アジアから見える世界〉，載左近幸村編著：《近代東北アジアの誕生——跨境史への試み》(札幌：北海道大學出版會，2008)，頁10-11。文中提及的專書，參見西村成雄：《中國近代東北地域史研究》(京都：法律文化社，1984)。
- ⑫ 金子文夫：〈戰後日本植民地研究史〉，載大江志乃夫等編：《近代日本と植民地》，第四卷，〈統合と支配の論理〉(東京：岩波書店，2005)，頁289-317。
- ⑬ 藤井正夫：〈滿洲國〉，載山根幸夫編：《中國史研究入門》，下卷(東京：山川出版社，1983)，頁433-41。
- ⑭ 塚瀨進：〈マンチュリアの社會變容と地域秩序——明代から中華人民共和國の成立まで〉(日本中央大學博士論文，2014)，頁43。同年該論文在日本出版，參見塚瀨進：《マンチュリア史研究——「滿洲」六〇〇年の社會變容》(東京：吉川弘文館，2014)。
- ⑮ 松田利彥著，陳延媛譯：〈日本帝國在殖民地的憲兵警察制度：從朝鮮、關東州到滿洲國的統治樣式遷移〉，《台灣史研究》，第14卷第4期(2007年12月)，頁85。
- ⑯ 關於這場爭論的具體介紹，參見林曉萍：〈「族」、「域」、「國」話語之爭——以20世紀30、40年代的東北問題為中心〉(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9)。
- ⑰ 毛利英介：〈滿洲史と東北史のあいだ——稻葉岩吉と金毓黻の交流より〉，《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第48卷(2015年4月)，頁343-63。
- ⑱ 參見鄭毅、李少鵬：〈近代日本知識人的滿蒙史觀研究——以稻葉岩吉的「東亞史觀」為中心〉，《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頁33-38；文春美：〈滿鐵「歷史地理調查部」與「滿鮮史觀」〉，《史學理論研究》，2018年第3期，頁118-25。
- ⑲ 胡玉海：〈東北義勇軍抗戰的歷史地位〉，《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頁15。
- ⑳ 谷曼：〈改革開放以來國內東北抗日義勇軍史研究述評〉，《長白學刊》，2018年第1期，頁110-15。
- ㉑ 淺野豐美：〈如何認識台灣史和日據時代〉，載劉傑等：《超越國境的歷史認識：來自日本學者及海外中國學者的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260-72。
- ㉒ 焦潤明：〈論東北抗日義勇軍精神及其歷史意義〉，載范麗紅主編：《「九一八」研究》，第十六輯(瀋陽：遼寧出版社，2017)，頁193。
- ㉓ 齊紅深編著：《流亡：抗戰時期東北流亡學生口述》(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黑暗下的星火：偽滿洲國文學青年及日本當事人口述》(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
- ㉔ 孫一：〈在偽滿洲國上學〉、張興武：〈在偽滿洲國的監獄裏〉，載《流亡》，頁8、60。
- ㉕ 李文良：〈日本統治初期台灣における「理蕃政策」〉，載和田春樹等編：《岩波講座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第三卷，〈世界戰爭と改造1910年代〉(東京：岩波書店，2010)，頁164、166。
- ㉖ 劉曉麗：《異態時空中的精神世界：偽滿洲文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236。
- ㉗ 劉曉麗：〈解殖性內在於殖民地文學〉，《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1期，頁111。

- ⑳ 陳言：《忽值山河改：戰時下的文化觸變與異質文化中間人的見證敘事(1931-1945)》(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劉曉麗、葉祝弟主編：《創傷：東亞殖民主義與文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7)。
- ㉑ 史密斯(Norman Smith)著，李冉譯：《反抗「滿洲國」：偽滿洲國女作家研究》(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
- ㉒ 大久保明男：《偽滿洲國的漢語作家和漢語文學》(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頁111。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學者由於歷史處境的差異，較少受困於民族國家立場，也產生了許多探索東北淪陷區文人身處黑白之間的灰色地帶的研究成果。參見川村湊：〈金史良と張赫宙——植民地人の精神構造〉，載大江志乃夫等編：《近代日本と植民地》，第六卷，〈抵抗と屈從〉(東京：岩波書店，1993)，頁205-34；岡田英樹：〈「滿洲國」の中國人作家——古丁〉，載大江志乃夫等編：《近代日本と植民地》，第七卷，〈文化のなかの植民地〉(東京：岩波書店，1993)，頁253-74；岸陽子：〈「滿洲國」の女性作家、梅娘を讀む〉，載中見立夫等編：《滿洲とは何だったのか》(東京：藤原書店，2004)，頁336-51。
- ㉓ 金在湧著，朴麗花譯：《韓國近代文學和「滿洲國」》(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頁3。
- ㉔ 吳雅琪：〈評介Norman Smith，《反抗的滿洲國：中國女性作家與日本的佔領》〉，頁298。
- ㉕ 劉曉麗：〈偽滿洲國語境中東亞連帶的正題與反題〉，《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頁69。
- ㉖ 蒂普斯(Dean C. Tipps)：〈現代化理論與社會比較研究的批判〉，載布萊克(Cyril E. Black)編，楊豫、陳祖洲譯：《比較現代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頁114。
- ㉗ 參見鄭家馨：〈關於殖民主義「雙重使命」的研究〉，《世界歷史》，1997年第2期，頁87-97；林華國：〈怎樣認識馬克思關於殖民主義的「雙重使命」論〉，《歷史教學》，2002年第3期，頁5-10；李士珍、王奇昌：〈馬克思「雙重使命」說再探——基於對當前美化殖民統治思潮的反思〉，《教學與研究》，2014年第12期，頁39-46。
- ㉘ 史書美著，何恬譯：《現代的誘惑：書寫半殖民地中國的現代主義(1917-193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43。
- ㉙ 平島敏夫：〈發刊詞〉、岸信介：〈推薦辭〉、椎名悦三郎：〈推薦辭〉，載《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滿洲國史(總論)》(哈爾濱：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1990)，頁6、8、9。
- ㉚ 西村成雄：《中國近代東北地域史研究》；岡部牧夫著，鄭毅譯：《偽滿洲國》(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井上清著，宿久高等譯：《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依田熹家：《日本帝國主義と中國》(東京：龍溪書舍，1988)；淺田喬二：《日本帝國主義と舊植民地地主制——台灣・朝鮮・「滿洲」における日本人大土地所有の史的分析》，增補本(東京：龍溪書舍，1989)。
- ㉛ 具體參見陳秀武、林曉萍：〈戰後日本如何書寫「滿洲國」合法性——以日編〈滿洲國史(總論)〉為例〉，載陳秀武主編：《近代中國東北與日本研究》，第二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頁129-30。
- ㉜ 高曉燕主編：《東北淪陷時期殖民地形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45-49、170-82；蘇崇民：〈關於東北淪陷史研究上的幾個問題〉，《東北亞論壇》，1994年第3期，頁88-89。
- ㉝ 燕紅忠：《貨幣、信用與貿易：在東北探尋近代金融(1860-1931)》(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20)。
- ㉞ 越澤明著，歐碩譯：《偽滿洲國首都規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原書名為《滿洲國の首都計劃——東京の現在と未來を問う》(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1988)。
- ㉟ Bill Sewell, *Constructing Empire: The Japanese in Changchun, 1905-45*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9).

- ④③ 山本有造：〈「滿洲國」：ある歴史の終わり、そして新たな始まり〉，載《滿洲とは何だったのか》，頁70。
- ④④ 中見立夫：〈「滿洲國」の「外務省」——その組織と人事〉，載江夏由樹等編：《近代中國東北地域史研究の新視角》（東京：山川出版社，2005），頁121-53。
- ④⑤ 平田康治：〈滿洲國の政治と經濟——戰時開發國家とその遺産〉，載川島真編：《近代中國をめぐる國際政治》（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4），頁207-61。
- ④⑥ 岩崎育夫：《アジアの國家史——民族・地理・交流》（東京：岩波書店，2014），頁13、150。
- ④⑦ 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國の肖像》（東京：中央公論社，1993），頁6-13。
- ④⑧ 三谷太郎：〈滿洲國國家體制と日本の國內政治〉，載大江志乃夫等編：《近代日本と植民地》，第二卷，〈帝國統治の構造〉（東京：岩波書店，1992），頁179-213。
- ④⑨ 陳榮聲：〈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國の肖像》增補版〉，頁291。
- ④⑩ 例如姜念東等：《偽滿洲國史》（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解學詩：《偽滿洲國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④⑪ 蘇崇民：〈關於東北淪陷史研究上的幾個問題〉，頁88。
- ④⑫ 左近幸村：〈東北アジアから見える世界〉，頁2。
- ④⑬⑭ 小峰和夫：《滿洲（マンチュリア）——起源・植民・霸權》（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91），頁4-6；119-25。
- ④⑮⑯ 塚瀨進：〈中國東北統治の變容——一八六〇—一八〇年代の吉林を中心に〉，載《近代東北アジアの誕生》，頁269-94；286-87。
- ④⑰⑱ 塚瀨進：《滿洲國：「民族協和」の實像》（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頁3、5；128。
- ④⑲⑳㉑㉒ 塚瀨進：〈マンチュリアの社會變容と地域秩序〉，頁6-7；7；267；6。
- ④㉓ 比如日本清史研究者石橋秀雄，在研究清朝入關前史的時候，便使用了「マンジュ」（Manju）作為「滿洲」的表述。這樣表述的好處在於，將賦予詞彙內涵的權力重新返還入關前的滿人群體。參見石橋秀雄：〈清朝入關のマンジュ（Manju）滿洲の呼稱をめぐる——「御製清文鑒」と「滿洲源流考」を中心に〉，載石橋秀雄編：《清代中國の諸問題》（東京：山川出版社，1995），頁32。
- ④㉔ 本文雖然在此姑且將「マンチュリア」（Manchuria）翻譯為「滿洲」，但兩者之間的對應關係內涵並不一致。或許音譯「滿珠利亞」會更加妥當，至於如何翻譯，仍有待進一步討論。
- ④㉕ 具體參見中見立夫：〈「地域」「民族」という萬華鏡、「周」「邊境」と呼ばれる假想空間〉，載中見立夫編：《境界を超える——東アジアの周縁から》（東京：山川出版社，2002），頁17-18；中見立夫：《「滿蒙問題」の歷史構造》（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頁1-28。
- ④㉖ 比如小峰和夫認為，清朝時期的滿人沒有將「滿洲」作為地域詞彙使用，直到清末才有「東三省」說，但實際上清末受到日俄兩國殖民擴張的影響，清朝文書中亦可見用「滿洲」指代地域。小峰和夫對外交史實缺乏了解，導致其得出了「滿洲」概念沒有殖民意圖的錯誤結論。參見小峰和夫：《滿洲（マンチュリア）》，頁121。
- ④㉗ 具體可參見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第一章。
- ④㉘ 霍布斯鮑姆（Eric J. Hobsbawm）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五章。
- ④㉙ 毛里和子：〈邊境學からみた地域・民族・國家〉，載《境界を超える》，頁190-91。
- ④㉚ 關於山影進的具體觀點，詳見山影進：《對立と共存の國際理論：國民國家體系のゆくえ》（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第三章。